

日藏宋版《論衡》考辨

顧歆藝

現存東漢王充《論衡》的宋刻本，除收藏於中國大陸的幾種之外，最負盛名的便是現藏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的宋刻二十五卷本了。這一版本因其珍稀性，自近代以來在日本和中國都每被研究者所提及，然而對它真正進行目驗或作深入調查研究的學者卻並不多，所論也歧義紛現。特別是中國學者，由於客觀條件所限，難免霧裏看花。筆者因參加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項目，並在早稻田大學交流研究一年，因緣際會，有幸實際查看包括宋版《論衡》在內的珍本秘笈，故對此版《論衡》情況有所認識和體會。今將宮內廳藏宋版《論衡》相關問題特別是版本問題略加梳理和考辨，求教於方家，並向提供各種研究條件的諸位先生表達感激之情。

《論衡》作者王充（27-約97），字仲任，會稽上虞（今屬浙江）人，東漢著名思想家。他一生潛心學術，特立獨行，好博覽而不守章句。著述有《論衡》、《譏俗》、《節義》、《政務》、《養性書》等，除《論衡》外，均不傳世。《論衡》為王充代表性著作，按照他在《論衡·自紀篇》中對此書撰寫的表述，“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才出百⁽¹⁾”，可知最初《論衡》的規模不下百篇，但《抱朴子》、《後漢書》的王充本傳均著錄《論衡》為八十五篇。葛洪《抱朴子》曰：“王充好論說，始詭異，終有理。乃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牆壁各置筆類，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始得之，秘玩以為談助。後王朗得其書，時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²⁾。”後人常常提及蔡邕、王朗對《論衡》的傳播推廣之功，即源于葛洪的記述。但也正是自蔡邕開始，由於被人從蔡邕那裏“捉取數卷持去⁽³⁾”，《論衡》便不再如當初那樣完整，因而葛洪、范曄所見就只有八十五篇而不是百餘篇了。這也是唐宋以來人們所能見到的《論衡》的內容。而傳世《論衡》中，其第四十四篇《招致》一篇實則有目無文，所以《論衡》一書實際存世八十四篇。這八十四篇一般被編排成三十卷，流傳於後世。古典目錄中最早著錄《論衡》的是《隋書經籍志》，列入雜家類，曰“《論衡》二十九卷，後漢徵士王充撰⁽⁴⁾”。《舊唐書經籍志》著錄“《論衡》三十卷，王充撰⁽⁵⁾”。二者卷數相差一卷，也許是性質不同於其他篇章的《自紀篇》或合或分而造成的。

王充《論衡》三十卷中，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宋刊本《論衡》今存二十五卷，即卷一至卷二十五，而卷二十六至卷三十的五卷則缺失，所以此本並非完帙，被稱作宋本殘卷。

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宋版《論衡》二十五卷，被分裝成十二冊。除第七冊收有三卷外，其餘均為每二卷一冊。其中卷十五有《招致篇》的篇目，下注一“闕”字而無正文。至此版末篇卷二十五的《祭意篇》，共收文七十七篇。可以推知，後面缺五卷八篇。此本書名題為“論衡卷第（幾）”，

卷尾亦同。全書沒有總目錄，但每卷卷名之下有該卷目錄，正文緊隨其後。另外，書的前後均無正文之外的文字，如序跋等。

此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間或為十九字、二十一字。偶有雙行小字，或為正文，或為校語。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版框高 22 釐米，寬 15 釐米。版心單魚尾下有“論衡幾”字樣標記卷數，下記本卷葉數，最下方有刻工姓名。刻工有王永、王林、王政、王存中、徐顏、徐亮、徐彥、陳俊、陳明、李憲、李文、趙通、高俊、許中、方佑、楊昌、朱章、宋瑞、張謹、周彥、劉文、卓宥、卓佑、潘亨、毛昌、毛奇、洪新、洪悅、梁濟等，多為浙江紹興地區刻工。

書中避宋代諸帝名諱及嫌名，如“玄、弦、朗、敬、驚、弘、殷、匡、筐、竟、境、胤、恒、貞、征、樹、豎、讓、桓、完、構、購、慎”等字，皆缺末筆。

此日藏宋版《論衡》書品極佳，雖是殘卷，但保留下來的二十五卷文字相當完整，除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五因書脊磨損而稍有缺字外，整體來看文字齊全，沒有缺失，只是某些地方有裝訂錯誤，計有三處：

- 1、卷一的第八葉與第九葉，原書顛倒錯亂，以至於第八葉《累害篇》的內容誤入後面的《命祿篇》中。

- 2、卷十四的第十四葉與第十五葉，即《譴告篇》的末二葉，原書互相顛倒。

- 3、卷十六的第五葉與第六葉，原書互相顛倒。

至於版本品像，正如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所描述的那樣：“文字遒勁，筆畫端正，絕有顏公筆法。加之鐫刻鮮朗，紙質淨緻，墨光煥發，若法帖然，實宋槧之絕佳者。”⁽⁶⁾ 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也對此書大加讚揚：“《論衡》一書，以是書為最善。”⁽⁷⁾

然而，日本學者及中國學者對於此宋版《論衡》的專門著錄和研究卻是晚至近代以來的事情。較早的是森立之《經籍訪古志》，然後是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後者 1905 年由日本民友社出版。之後，中國學者在此二書的引導下，逐漸獲知此一宋版《論衡》的存在。董康《書舶庸譚》⁽⁸⁾卷三、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均著錄此本。董康《書舶庸譚》前四卷是他於民國十五年（1926）十二月至十六年（1927）五月避居日本時所記；傅增湘著錄此本後注曰“日本帝室圖書寮藏書，己巳十一月十一日見”，己巳年是民國十八年（1929）。可見董康、傅增湘都應該是親眼目睹了此宋版《論衡》的。然而也許只是匆匆一閱，他們的著錄均較為簡略，亦有不準確之處。

前人對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宋本《論衡》的記述不夠詳細，而此書前後也並無序跋等輔助材料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瞭解它，所以要對此版本《論衡》作進一步的探究，我們只能從原書入手，並且考察一下《論衡》一書在宋代的刊刻歷史。

先看避諱字。如前所述，此本對宋代諸帝之名及嫌名多有避諱，避諱方式是缺筆。我們發現此書避諱有如下特點：

- 1、避諱至“慎”字。我們統計全書，出現“慎”字 33 處，均缺筆。此避諱極其嚴格，無一例外。

- 2、其他避諱不特別嚴格，如“敬”、“桓”、“溝”字，有時缺筆，有時不缺筆。

南宋孝宗名“昚”，“慎”通“昚”，從避諱字推測，此宋版《論衡》的刊刻年代當為孝宗之時。

然而，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卻謂此書為“殘宋光宗時刻本”，可他並沒有給出任何理由。我們核查了原書，並未發現此本避孝宗之後的光宗名諱。光宗名惇，“惇”這個字不常用，《論衡》一書亦無。一般來說，避光宗諱是避其嫌名，如“敦、墩、慙、燉、惇、鶉”等字。在此宋版《論衡》中，出現“敦”的地方都不缺筆避諱（卷二《率性篇》2處、卷十《非韓篇》1處、卷十九《依國篇》1處），出現“鶉”的地方亦不缺筆（卷二《無形篇》2處、卷七《道虛篇》1處、卷十六《講瑞篇》1處）。如果不避當朝皇帝名諱的話，就很難得出島田翰“蓋光宗時刻本也”的結論。不僅如此，光宗之後的寧宗，名諱“擴”，此本《論衡》卷五《感虛篇》有一處“擴”字，不缺筆避諱。此外如嫌名“郭”、“廓”，出現多次，亦不避諱。因此可以推斷，日藏宋本《論衡》是刊刻于南宋孝宗朝的，而不是其後的光宗朝或寧宗朝。

《論衡》一書在當今中國最通行的整理本是中華書局1990年出版的《論衡校釋》，收入《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它以民國二十四年黃暉《論衡校釋》為主，補入劉盼遂《論衡集解》。在黃暉的《自序》中，他梳理了一個《論衡》版本源流表，其中提到一個早期版本“宋光宗時刻本（二十五卷）”，說是“見存日本，疑是根源慶曆本⁽¹⁰⁾”。顯然黃氏並未見過日藏宋本《論衡》，而所謂“宋光宗刻本”的說法是從島田翰那裏沿襲而來的錯誤。

再看刻工。上文所列日藏宋本《論衡》的刻工，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間浙江紹興地區的刻工。除《論衡》外，他們還刊刻過其他一些書籍，可以作為佐證。其中的一些人參與過兩浙東路茶鹽司主持的著名的越州八行本經書注疏的刊刻工作，如周彥曾刻越州八行注疏本《禮記正義》等，毛昌曾刻越州本《周易注疏》、《尚書正義》、《周禮疏》等。兩浙東路茶鹽司治所在越州，即今浙江紹興。再如，現藏上海圖書館的《諸儒鳴道》七十二卷，為南宋孝宗時刻本，理宗端平二年（1235）閩川黃壯猷修補。刻工中有周彥、許中、毛昌、洪新、陳明、李文、王永、李憲、洪悅等⁽¹¹⁾，他們多為孝宗、光宗時的浙中刻工名匠，也參與刊刻了日藏宋版《論衡》。此外，從這些宋版書籍的字體刊刻風格來看，也是極其相似的。

那麼，《論衡》在宋代有著怎樣的刊刻歷史呢？是否可以證明南宋孝宗朝在浙江紹興地區真的刊刻過《論衡》？《論衡》明嘉靖時通津草堂刻本附有宋慶曆五年（1045）二月二十六日楊文昌刻本序（此序在《四部叢刊》影印通津草堂本《論衡》時未收），其中說：

余幼好聚書，於《論衡》尤多購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貯，蓋今起居舍人彭公乘魯所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各三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乘前所校者也。余嘗廢寢食，討尋眾本。雖略經修改，尚互有關疑遺意。其謄錄者誤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僮遂傳行，必差理實。今研覈數本之內，率以少錯者為主，然後互質疑謬，沿造本源，訛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闕者複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為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即募工刊印，庶傳不泯，有益學者，非矜己功⁽¹²⁾。

由此可知，《論衡》在北宋初期仁宗朝的慶曆年間已經流傳著很多本子，而且卷數各不相同，有二十七卷本，也有三十卷本。它們分藏於各處，輾轉傳抄，文字差異很大。楊文昌綜合眾本，詳加校勘，補缺訂正，最後刊印成一個比較精善的版本。楊文昌的《論衡》刊定本是後人所知的最早的宋刻本，也是後來《論衡》刻本的祖本，影響很大，但沒有流傳下來。

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洪适知紹興府。第二年（1167）他主持校刻了《論衡》一書。洪适（1117-1184），字景伯，號盤洲。高宗紹興年間，洪适、洪遵、洪邁三兄弟先後考中博學宏詞科，名聲大噪，人稱“鄱陽三洪”。洪氏三兄弟歷仕中央和地方，頗有政聲。在文學和學術研究上，他們更是卓有建樹，聲名遠揚。洪适官至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在金石學方面造詣頗深，其《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考證精審，很有影響。另有《盤洲文集》八十卷傳世。

《盤洲文集》卷六十三有一篇洪适所作《論衡跋》：

右王充《論衡》三十卷。王君，是邦人也。帳中異書，漢儒之所爭睹。轉寫既久，舛錯滋甚，殆有不可讀者。以數本俾寮屬參校，猶未能盡善也。刻之木，藏諸蓬萊閣，庸見避堂舍蓋之意。乾道丁亥五月十八日，會稽太守洪适景伯跋。

孝宗乾道丁亥年即乾道三年（1167），此時洪适知紹興府。由於王充是紹興本地先賢，所以洪适公費主持刊刻了王充的著作《論衡》。據《論衡》元至元七年（1270）刻本的韓性跋所言：“諸本繕寫互有同異，宋慶曆中進士楊文昌所定者號稱完善，鄱陽洪公重刻於會稽蓬萊閣下。”按照韓性的說法，洪适的《論衡》似乎是楊文昌所定本的重刻本，其實也並不是那麼簡單。從洪适“以數本俾寮屬參校，猶未能盡善也”的表述來看，他主持刊刻《論衡》是下過一番校勘功夫的，儘管他所依據的底本可能是楊文昌所定本。

至此，我們或許可以說，現存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的宋版《論衡》，就是南宋洪适於孝宗乾道三年知紹興府時主持刊刻的那個版本。另外，還有一個旁證也可以證明這一結論。

《盤洲文集》卷六十三有一篇洪适的《跋元微之集》：

右《元微之集》六十卷。微之以長慶癸卯鎮越，大和己酉召還，坐嘯是邦，閱六寒暑。……微之留越許久，其書獨缺，可乎？予來踵後塵，蓋相去三百三十七年矣。乃求而刻之，略能讎正脫誤之一二，不暇複為詮次也。書成，置之蓬萊閣。⁽¹⁴⁾

與洪适主持刊印王充《論衡》的原因相同，由於唐代詩人元稹在紹興這個地方作過官，是與當地相關的先賢，所以洪适也要刊刻他的著作，以光大紹興地方文化。與刊刻《論衡》一樣，洪适刊刻《元微之集》時也是先搜集舊本，加以校勘，書刻成後均置於蓬萊閣。

洪适主持刊刻的元稹文集現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不過已僅存三卷，名曰《元氏長慶集》，殘存卷四十至卷四十二。按照《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的解題著錄和圖版照片，我們可以得

知，《元氏長慶集》版框高 21.7 釐米、寬 14.8 釐米，與宮內廳著錄的《論衡》版框高 22 釐米、寬 15 釐米相似。雖然二者每半葉行數不同，但都是版心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偶有雙行小字。版心單魚尾的位置相似，也都是下有“元集幾”（類似“論衡幾”）的字樣標記卷數，再下記本卷葉數，最下方是刻工姓名。二者不僅版式，字體風格也極其相似。另外也都是避宋諱到“慎”字。特別是刻工，《元氏長慶集》殘卷有王存中、周彥、毛昌、李詢的名字，而前三人也同時見於宮內廳宋版《論衡》。因此可以說，日藏宋版《論衡》和《元氏長慶集》二書刊刻於同一地區同一時代，風格相同。正是南宋孝宗乾道年間洪适知紹興府時精加校刻的先賢著作的善本。

《論衡》宋代刻印本現今仍存世的，除日本宮內廳書陵部這部宋代刻本之外，《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顯示，中國國內尚有四處宋本《論衡》收藏。不過，藏於南京博物院的僅存四卷殘卷，上海圖書館的存五卷殘卷，中國國家圖書館存兩部全本。其中除了南京博物院的那種因涉及文物保護而不得閱覽外，其他三種我們與宮內廳宋版《論衡》作了對比，有些初步考察。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論衡》是同一類書的兩部，均著錄為“宋乾道三年紹興府刻宋元明遞修本”，三十卷。其中一部有清錢謙益批點、黃丕烈跋、葉昌熾題款，上有“汲古閣”、“錢謙益印”、“士禮居藏”、“鐵琴銅劍樓”等印記，在中國國內一直被視為《論衡》的最佳版本而受到重視。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曰：“余聚書四十餘年，所見《論衡》無逾此本。……其最佳者，斷推此為第一本矣。”⁽¹⁵⁾《中華再造善本叢書》據以影印，並收入《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之中。然而此宋元明遞修本《論衡》中真正的宋刻部分所占比例卻甚少，零零散散，且文字漫漶不清，絕大多數都是後代遞修的。我們將此書的宋刻部分與宮內廳書陵部宋版《論衡》相比較，發現二者版式相同，字體各異，顯然是有前後承繼關係的。宮內廳書陵部宋版《論衡》的文字清晰度、墨色飽滿度等書籍品像均大大優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錢謙益批點、黃丕烈題跋本，其刊刻年代似應在先。如此一來，中國國內一般認為的藏於國圖的著錄為“宋乾道三年紹興府刻宋元明遞修本”的著錄就很成問題了，因為這一年份的推斷是基於洪适刊刻《論衡》的史料記載而來的，而宮內廳書陵部的品質好很多的《論衡》宋本，才應該是洪适的《論衡》初刻本。至於乾道三年紹興府是否立即翻刻了當年剛剛刊印的《論衡》，便十分值得懷疑了。

然而，現藏於上海圖書館的著錄為“宋乾道三年紹興府刻元公文紙印本”的宋刻本卻值得我們特別關注。此本亦為殘卷，僅存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也就是《論衡》一書的後五卷。其實最後一卷（第三十卷）的《自紀篇》是殘缺的，存九頁半。此上圖宋版殘卷《論衡》的版式為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下記刻工姓名。與宮內廳的宋版《論衡》版式相同且刻工姓名同，另外字體也沒有區別。奇妙的是卷數也合得上，宮內廳宋版《論衡》為卷一至卷二十五，上海圖書館宋版《論衡》為卷二十六至卷三十，十分巧合。我們或許有理由認為二者是同一部書的不同部分。事實上，一些學者也是這樣推測的。如傅增湘就認為後者（存卷二十六至卷三十的宋刊本）⁽¹⁶⁾“與日本所藏同”。另外，上海圖書館宋刻本有曹元忠書於辛亥（宣統三年，1911）的跋語，亦曰：“宣統二年十月，偶遊廠市，見《論衡》殘本，自第二十六至三十都五卷。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版心有刻工毛奇、梁濟、卓佑、許中、陳俊、趙通、潘亨、周彥、徐顏、李文等姓名，皆宋刊也。字體方正渾厚，間有元時修補者。……余知為宋洪适會稽蓬萊閣本，元宋

文瓚所補刻也。……近時日本島田翰著《古文舊書考》，稱其國秘府有宋本《論衡》二十五卷。其行款格式並刻工姓名與此悉合，而闕卷二十六以下，是彼之所闕即此五卷。倘能璧合，豈非快事。”的確，這種歷史的巧合堪稱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快事！

最後，我們從日藏宋版《論衡》的流傳過程來看看此版本的可靠程度。此書在最終歸藏於宮內廳書陵部之前，曾輾轉於日本若干藏書家之手。從書上的藏書印看，主要是每冊首葉的“宮內省圖書印”，另有“木村”小圓朱印，別無他印。關於此書的收藏史，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之說應比較可信。此宋版《論衡》先是為狩谷望之（椽齋）求古樓所收，後歸於岡本縫殿之助（況齋）。島田翰聽木村正辭說，岡本況齋即將病逝之時，叮囑門人木村正辭“且捺一小印以為左券”，也就是後來人們可以看到的卷首所捺“木村”小圓印。再後來細川潤次郎（十洲）在書肆琳琅閣獲得此書，最終此書入藏宮內廳書陵部。

原書有狩谷椽齋和細川十洲的手識附紙，記述此書的流傳原委及版本面貌。書的天頭地腳有毛筆批註，從字體看，可能出自狩谷椽齋之手。狩谷椽齋手識文（漢文）曰：“是本第二卷第十三葉脫逸，以昌平官本校合之亦複同，蓋揭出之時板失而爾，非後來逸者也。”然而奇怪的是，狩谷所說的第二卷第十三葉今本並未脫逸，也無異樣。細川十洲手識文有二則，寫於明治三十六年（1903）十月，一用日文，一用漢文。日文手識曰：“宋版《論衡》十二卷，本為狩谷椽齋求古樓藏書，其後歸木村正辭所有，終為宮內省所購入。此書見於《經籍訪古志》，止於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以下全缺。又第一卷之《累害篇》中有錯簡一葉，誤入《命祿篇》中。”另一則手識補充說：“坊本脫此一簡，幸有此書可據以訂正，但當在《累害篇》中耳。明治癸巳⁽¹⁷⁾。”值得注意的是細川十洲日文手識先說“宋版《論衡》十二卷”，後又說“止於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以下全缺”，似乎矛盾。嚴紹盪認為“十二卷”實為“十二冊”之誤，我們贊成這個意見。董康《書舶庸譚》說：“細川潤次郎和文跋，謂前十二卷為狩谷椽齋求古樓藏書，餘為木村正辭藏書，然長短紙色實為一書，蓋佚而復合也。”然而細川潤次郎跋文中並沒有董康所說的內容，“佚而復合”只是他的猜測。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也沿襲了這樣的誤說。

狩谷望之（1775-1835）是江戶後期著名的文獻學家和考據學家，此宋版《論衡》在日本的傳承記載最早始於他，應該是可靠的。再往上追溯，便很難了。嚴紹盪《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之“論衡（殘本）二十五卷”解題的“附錄”部分列舉了一些《論衡》在日本的著錄情況，以及傳入日本的歷史記載：

九世紀末日人藤原佐世《本朝見在書目錄》第三十“雜家”著錄《論衡》三十卷，並題“後漢徵士王充撰”。這是《論衡》傳入日本的最早記載。

十二世紀藤原通憲《通憲入道藏書目錄》第三十三匱著錄《論衡》一帙十卷，又著錄《論衡》二帙十卷。

據《商舶載來書目》記載，中御門天皇寶永七年（1710）中國商船“以字號”載《論衡》一部八冊抵日本。中御門天皇正德元年（1711）中國商船“和字型大小”載《論衡》一部八冊抵日本。

嚴格地說，以上文獻材料都不能直接證明宮內廳此宋版《論衡》是何時傳入日本的。《本朝見在書目錄》著錄了《論衡》，說明《論衡》一書早在九世紀就傳入日本了，但那時候的書應該是抄本而不是刻本。此後《論衡》源源不斷地傳入日本，一方面說明日本社會對《論衡》一書的接受，另一方面也說明，像宮內廳典藏的此南宋《論衡》善本，傳入日本並妥善保存，是完全有可能的。

從《論衡》在中國的傳播研究史來看，宮內廳藏宋版《論衡》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宋元以後，《論衡》的通行本是明嘉靖時通津草堂刻本和以此明本為底本的諸多翻刻本，《四部叢刊》就影印了通津草堂本而使之廣為流傳。然而通津草堂本卻有缺頁，丟失不少原文。《論衡》卷一《累害篇》的“矣夫如是……不得名毛”一葉，共四百字，通行的通津草堂本及其翻刻本就脫落無存了。後來有人發現不太通行的元刻本中有此內容而加以補充。宮內廳所藏宋本《論衡》是有這部分內容的，只是在裝訂上有些顛倒。

王充《論衡》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部巨著，其特立獨行的思想閃耀著智慧的光芒。然而古代因為有“蔡邕以為談助”的說法，沒有受到人們足夠的重視，一直被列入子部“雜家類”。更因為《論衡》中有《問孔》、《刺孟》之類對傳統儒家思想質疑和挑戰的聲音，所以歷來被“正人君子”所垢病。清代樸學家對先秦兩漢典籍大多有深入系統的整理研究，而於《論衡》的全面深入研究卻闕如，只有零散的割記和校注之語。近代以來《論衡》的思想價值逐漸得到重視，出現幾部《論衡》全書的校注本或集解本。然而遺憾的是，整理者無一例外地都沒有見到和運用這部藏於日本的《論衡》現存最早最好的版本，令人遺憾。

概而言之，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宋版《論衡》殘本二十五卷，雖非完璧，但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宋版原貌，而且刊刻精善，大致可以推斷是南宋孝宗乾道三年洪适知紹興府時的官刻本，實屬難得。也較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刻元明遞修本保存宋版原貌更多，刊刻品質也更好。所缺五卷，可以用上海圖書館的宋本殘卷基本補齊。日藏宋版《論衡》是現存最早最好的版本。

【注】

- (1) 黃暉撰《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卷三十《自紀篇》，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202頁。
- (2)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二所引《抱朴子》佚文。參見《論衡校釋》附編三。
- (3) 《太平御覽》卷六〇二所引《抱朴子》佚文。參見《論衡校釋》附編三。
- (4) 《隋書》卷三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 (5) 《舊唐書》卷四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6) 森立之《經籍訪古志》卷四，《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一），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 (7) 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同上。
- (8) 董康著 朱慧整理《書舶庸譚》，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78頁。
- (9) 傅增湘撰《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662頁。
- (10) 黃暉《論衡校釋》自序，第8頁。
- (11) 參見《上海圖書館藏宋本圖錄》，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13頁。

- (12) 《論衡》明嘉靖年間通津草堂刻本附有宋慶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楊文昌刻本序，多為後人引用。
- (13) 《盤洲文集》卷六十三《論衡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14) 《盤洲文集》卷六十三《跋元微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15) (清)黃丕烈著 潘祖蔭輯 周少川點校《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四，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132頁。
- (16)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第663頁。
- (17) 筆者將日文翻譯成漢文。
- (18) 嚴紹盪編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之“論衡（殘本）二十五卷”解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109頁。